
饶漱石和新四军

童志强

抗日战争时期,饶漱石于1940年夏受命赴华中敌后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代主任、主任,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在1943年底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后,饶漱石便作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党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统辖华中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后,饶漱石因犯政治错误而从中国社会政治活动中销声匿迹。此后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浩如烟海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论著、新四军史研究论著和有关回忆录、史料汇编中,都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淡化饶漱石在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历史活动,造成了一段不应该有的历史空白。即使偶有提及,也大都持否定态度。笔者本着存真求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追踪饶漱石在华中敌后5年的历史轨迹,试对其在新四军工作时期的主要功过作一个力求实事求是的评判,以请教于新四军老战士和史学界同仁。

饶漱石到华中的历史背景

皖南事变发生前,中共东南各省党务工作是由中共中央东南

局领导的。东南局的前身为东南分局。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南方各游击区的工作,议决在南方各游击区“总的领导机关成立东南分局,主要做地方工作”,“以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5人为东南分局委员,项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

1938年1月,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受长江局领导。当时新四军建军伊始,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在新四军中的职务是副军长,对内实为政治委员,因此他的主要工作侧重在新四军。同年4月初,项英随军部东进到皖南,所以东南分局的工作实际上由副书记曾山主持。

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由项英、曾山担任正、副书记,直属党中央领导。1939年初,东南局由南昌迁到皖南泾县云岭,对外以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的名义,驻在距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罗里村5华里的丁家山。

东南局进抵皖南后,各项工作很快步入正规,但是项英和曾山之间随之也产生了一些矛盾。项英凭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对东南局实行家长制的领导,用曾山1941年5月17日致华中局电文中的话说,“项常常对一个同志不满,即可一个电话叫他滚蛋”。(本文所引党内、军内电报均存中央档案馆,以下所引电文不另注——笔者)项英片面强调军队的重要性,把地方党看作附属品,在军队与地方党发生矛盾时,一味偏袒军队。皖南竟然发生过军队干部把地方党的县委书记关进牛栏的事情。曾山曾于1940年4月专门就皖南新四军与地方党的矛盾致电延安,反映“军队党借此把地方党作为他部下看待”,“引起同志很多无谓纠纷”。在处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12月14日,存中央档案馆。

与项英矛盾时,曾山一度“采取否认我自己是副书记的办法,来希望中央知道我们中间有分歧”。以后,曾山又打电报到中央,因电报长,一次没有发完,延安来电催报,被项英知道,干脆撤了译电员的职。其专制蛮横作风可见一斑。

由于项英、曾山的矛盾影响了东南局的工作,更由于项英在皖南工作期间,“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从而影响了整个开辟华中敌后工作的大局。鉴于此,中共中央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在长江以北,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皖东,领导江北地方党和新四军武装,直接指导华中工作。对此,项英在1940年4月20日向中央军委发牢骚说:“对部队部署,事实上我只能负皖南与江南之责,因我之意见事实上不为人所重视,不过等于空话而已”,“军部仅为独立支队,不过对外是代表全军应付而已。”在长江以南,中共中央则决定派饶漱石到东南局担任副书记,直接指导东南区域党的工作。1940年4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中央已派饶漱石来帮助东南局工作,即经重庆来皖南。彼可主持江浙沪工作。”

饶漱石,江西临川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上海工人联合会主任,1933年任全总华北办事处主任,从事工人运动。1935年赴苏联,任中国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6年被派到美国工作。1940年春奉调回延安,于6月到达重庆。

在重庆,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饶漱石一起会见了因受项英排挤而长期滞留重庆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以及受周恩来之命从皖南赶来接叶挺回军部的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周恩来在谈话中,再次宣布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在长江以北地区,要求新四军军部争取移往苏南。会后,周恩来、饶漱石又单独会见袁国平。周恩来向袁国平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确定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饶漱石、曾山为副书记”。

同年8月,饶漱石随叶挺一行从重庆到皖南泾县云岭,以梁朴、小姚的化名住进丁家山东南局机关。

皖南事变前

饶漱石到东南局仅4个月,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这4个月中,他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第一,整理东南地区党务。饶漱石抵东南局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发现东南局和下属各省地方党组织之间联络困难,指导不畅,就首先致力于整理闽浙地区的党务工作。10月中旬,他召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代表及浙江各特委代表到皖南开会讨论工作,决定在闽浙边基本地区建立一个分局,而东南局则东移到苏南。会后,饶漱石以东南局名义于11月6日正式电报党中央,建议“(一)、东南局移苏南;(二)、在闽浙边基本地区建立分局;(三)、东南局直接指挥苏南、江南、浙西、苏皖边,而分局领导闽浙赣及皖南之一部,并速建立苏南与浙西之交通网,以便经浙西保持东南局与分局之联络,及建立闽浙边秘密电台”。同月14日,东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

局又致电党中央,建议在闽浙边建立东南局或分局,领导闽、浙、赣、皖南地方党,由饶漱石赴闽浙主持,曾山则专负苏南党的工作。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小姚去闽浙赣和曾山去苏南之提议”。不久,曾山即先饶漱石离开皖南。

此时,由于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阴谋围歼新四军军部和皖南新四军部队,南方各地形势日趋恶化,从而影响了饶漱石到闽浙赣的行动计划。1940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叶挺、项英的指导电中改变了同意饶漱石到闽浙赣的决定,该指示特别提到:“关于小姚行动,以苏南游击区是否便于指导东南各省为断,如有此条件,以随曾山去苏南为有利,如不可能,则去江北。”虽然最后决定饶漱石去江北,但他在组织、健全东南区域党的领导机构和地下交通的建立等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这一点,连项英在12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肯定说:“小姚来后,极力布置。”饶漱石本人尔后在皖南事变中能够辗转突围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南方这些地下交通站和地下党组织的掩护。

第二,对项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斗争。饶漱石到皖南前不久,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1940年5月4日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曾对项英在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政权、统一战线和对付国民党发动突然事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甚至提到“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的高度。对此,项英不仅拒不接受批评,拒绝传达中央指示,而且多次向中央撂挑子、掣纱帽。饶漱石甫抵皖南,项英一开始就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反复向他强调皖南的特殊性,反对把华北经验机械地搬到皖南,说中央不懂得皖南的具体情况,以此拒绝执行中央的政治方针。结果两人争执得非常厉

害,用饶漱石的话说就是“闹了四、五个钟头”。

以后,项英对饶漱石处处提防,抱有戒心,不让他公开场合讲话,不让他参加军部有关会议,也不给他看有关电报。并对周围的人说:“他是抗战以后才从国外回来的,他对中国情形不懂得。”饶漱石是个自视甚高的人,见项英如此排挤他,只得用婉转的口气致电延安,反映皖南不需要自己,以致许多情况都不知道。中共中央回电给项英,要他把皖南的情况向饶漱石通报,所有电报都要给饶漱石看,同时指示增补饶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但项英仍然我行我素,独断专行,不让饶漱石参加军分会会议。

第三,布置皖南秘密特委。当时皖南地方党的领导机关为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直接受东南局领导。皖南特委领导徽州中心县委和泾县、南陵、繁昌、铜陵、芜湖、宁国、宣城、旌德等县委,共有党员1.2万人,其中泾县有党员1700人,南陵、铜陵、繁昌各1000人。

1940年11月以后,皖南新四军开始作北撤的准备。在饶漱石的主持下,决定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和皖南各县已暴露的地方党员500余人随军北撤。另行成立新的皖南秘密特委,作为东南局和军部北撤后皖南党的秘密领导机构。任命刚撤到皖南不久的原江西省委组织部长黄耀南担任皖南秘密特委书记。留下来的党员分别成立由3—5人组成的小组,并规定这些小组在半年之内不要找组织,以免暴露,等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顶点过去后再活动。同时还布置少数地方武装留下来掩护党的工作。

饶漱石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1941年5月18日,存南京军区档案馆。

饶漱石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1941年5月18日。

饶漱石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1941年5月18日。

饶漱石在华中局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4月30日,存南京军区档案馆。

在皖南事变的白色恐怖中,有近千名被打散的新四军指战员在皖南沿江地方党的策应下安全突围抵达江北,绝大多数皖南地方党组织没有被国民党破坏,也是得益于上述周密布置。

皖南事变中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绕道北移,在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8万余兵力的围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按原定计划,饶漱石于1940年12月25日离开泾县云岭到繁昌新四军第三支队驻地,拟在那里搞到赴沦陷区的“良民证”后即化装经芜湖、上海去苏北与刘少奇、陈毅会合。他在那里等到29日,第三支队收到军部电报指示,命令全支队4日前赶到云岭集中北移。于是饶漱石在1月3日随三支队回到云岭,4日即编入第二纵队,随军部直属队行动。

按军分会1940年12月28日会议精神,皖南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改编成3路纵队,于1941年1月4日傍晚实施绕道茂林,再向东经苏南过江到苏北的军事行动。当时因天雨路滑,浮桥中断,部队于5日下午方到达茂林。6日黄昏继续行动,遇到国民党军阻击。7日中午,皖南新四军3路纵队分别击退国民党军阻击,一纵通过求岭,二纵出丕岭抵达星潭外围,三纵占领高岭后向星潭进发。

当时新四军退路已被截断,而此时星潭只有国民党军第四十师1个团的兵力防守。所以,新四军唯一的出路是迅速打开星潭,撕破包围圈。

饶漱石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1941年5月18日。

7日下午3时,军部在丕岭与星潭之间的百户坑召开会议。在要不要强攻星潭问题上,军部领导之间发生了分歧。

会议照例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待饶漱石得知消息、问清开会地点后赶去旁听时,会议已开了3个多钟头。军长叶挺的意见是宁愿牺牲一部分部队也要从星潭冲出去,项英则以保存部队为由,坚决反对硬拼,这样又争执了3个多钟头。最后,项英武断否定叶挺的正确意见,决定全军从星潭折回,改向高岭方向突围到太平。但又误走濂岭,部队转了一天,秩序混乱,只得折回里潭仓宿营。

8日,项英在里潭仓召开军部紧急会议研究对策,这次又没有通知饶漱石参加。饶漱石实在忍无可忍,冲进会场,质问项英:“我要知道你们的计划,我相信你们的行动对我没有什么秘密。我是军分会的一个委员,我要参加你们的讨论,我也许有些意见可以贡献,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超过常识了。”

当天下半夜,项英在接到机要处破译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上官云相命令9日发动对新四军全线总攻的密电后,竟然放弃领导责任,置全军将士之安危于不顾,率领十几个人不告而别,企图择路突围,以求保全个人生命。气得叶挺对饶漱石发火说:“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掉了,政治上我不能解释。我很气愤!”

在此情况下,饶漱石挺身而出,召集军直属队和第二纵队的领导干部开了一个会,向与会干部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竭力鼓励军长叶挺出来收拾残局。

9日天明后,叶挺和饶漱石集合教导总队和军直属队讲话,叶挺严肃而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部队,为了抗

饶漱石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1941年5月18日。

饶漱石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1941年5月18日。

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国民党蒋介石卑鄙无耻,他们不打鬼子,反而来阻止我们北渡长江。现在的处境,我们不得不忍痛来发挥你们这一批骨干的作用了。现在是每个人献身于革命的重大关头,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叶挺特别激愤地说道:“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部队顿时士气大振,斗志昂扬。

这时,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指挥所已进驻茂林杨山桥,并派出大批增援部队向高坦进攻,防守高坦的新四军第二纵队第三团据险阻击,战斗非常激烈。叶挺立即调教导总队增援第三团作战。与此同时,军部电台也已架设起来,叶挺、饶漱石遂联名致电在延安的党中央和在苏北盐城的中原局,报告当时的困难情况:“今(9)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子昆、一氓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先收到电报,立即向叶挺、饶漱石复电指出:“项、袁、周、李不告而去,脱离部队,甚为不当,即在以前他们亦有许多处置不当,违反中央的指示,致造成目前困难局面。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并直令二支队接应。”刘少奇同时又发出一个致叶挺、饶漱石并转皖南新四军各部负责人的电报,在宣布党中央关于“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江南所有战争区域之党与部队工作统一归中原局领导”的决定后,向他们强调指示:“项英同志及袁、周二同志闻已离开部队,致使江南党的领导顿失中心,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同志之指挥,以打破顽固派之包围,胜利的转移到苏南北渡。”同日,刘少奇又致电延安,建议中共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

挽危局”，强调指出，“无论如何，再不能让项继续负责了，早撤职一天，早好一天”。

叶挺、饶漱石接电后临危受命，在高坦徐家祠堂北面的高地蛇山，设立了指挥所，准确及时地下达各项命令。经过9日一天的激战，终将顽一四四师击退。到黄昏，叶挺、饶漱石率领第三团、教导总队和军直属队甩开茂林之敌，向东北方向开进，准备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然后由铜陵、繁昌一带渡江北上。后因沿途遭到国民党军不断袭扰，混战一夜仅行20余里，致使原定计划无法实现，于是全军于10日早晨进入横直不过数里的石井坑。

在石井坑，叶挺、饶漱石联名发出致胡服并转延安电：“支持4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10日下午，项英、袁国平等因突围不成，又回到军部，认识到擅自离队的错误，遂电胡服转中央：“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壘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至9日即感觉不对……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11日，饶漱石以个人名义单独致电党中央反映新四军的问题及与项英的分歧：“我抵此后，关于发展问题曾与项发生空前争论，但为干部团结计，故自后我采忍耐之态度”；“我军在一个月前由皖渡江完全可能，只是项之犹豫迟疑所阻”；“我虽为东南局及军分会委员之一，但项对此次军事计划及一切会议，完全不要我参加，一直到不告而别，实令人寒心”；最后，他向党中央表示决心：“我为革命而牺牲，正我初衷。但在这次万一不幸，死不瞑目，并愧不能负中央所予重任。”同日，饶漱石还同叶挺、项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汇

报皖南当前敌情,以及新四军“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箝制多数,控制一个团以上强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的方针。不久,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延安发出致胡服即转叶、饶及全体同志电,指出:“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叶挺、饶漱石,宣布中央决定:“一、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二、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同一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联名致电胡服即转叶挺、饶漱石,建议皖南新四军应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同时指出,“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指示他们“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此外,毛、朱、王在另一个致叶、饶、项的电报中再次强调:“军中一切由希夷作主,小姚辅之,全军应服从希夷命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

12日子夜,叶挺、饶漱石指挥被包围在石井坑的剩余部队分散突围。叶挺、饶漱石等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为一路。各部队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江北无为。叶挺、饶漱石等冲出石井坑后,连夜翻过火云尖,于13日拂晓抵达西坑,又遭国民党军包围。14日,饶漱石根据党中央12日关于“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的指示精神,以党的名义说服叶挺下山与国民党谈判。

叶挺和饶漱石的努力虽然未能挽回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但是,不谙军务的饶漱石作为党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在这场事变中表现出来的胆识和勇气,是引人注目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叶挺下山谈判,被国民党军队无理扣押。饶漱石在山上继续隐

蔽,后被搜山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士兵发现被捕。饶诡称自己是美国华侨,归国抗日,担任新四军军需仅几个月。在国民党连部,他用金钱收买了国民党连长,由其代办便衣、路条,得以脱险,逃出虎口。

饶漱石从茂林脱险后,经太平县城转车到皖南屯溪。得益于他在东南分局分管地方党工作,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党的秘密联络点。经地下交通站交通员王嗣安排在阳源一个地下党员汪茫家里隐蔽,并与南方局取得联系。2月12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告知“饶漱石(小姚)同志已脱险”,“不日去金华或赴苏北,或来重庆,看情况决定”的消息。

不久,在阴历年底快过春节的时候,饶漱石由皖南地下党掩护从屯溪乘汽车到浙江兰溪。再经浙江地下党安排辗转到达上海。饶漱石沿途经过屯溪、兰溪、金华等地时,根据当时形势,对各地党组织“独立自主地布置工作,正确的估计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要采用强迫的手段进攻我东南局的党部,同时在皖变中,必然有叛变分子泄漏我们党的秘密。如果没有这种布置,当时必然受到一些损失。因为在新四军领导机关及东南局分散后,整个华南党失掉了领导中心,所以饶漱石同志这种行动有很大的作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1941年5月17日在华中局高干会议发言时对饶漱石上述工作的肯定是符合实际的。

可以这样认为: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饶漱石在屯溪》,屯溪市委党史办《党史资料》第6期,1983年1月。

陈毅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发言,1941年5月17日,存南京军区档案馆。

刘少奇的得力助手

为了从政治上全面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25日, 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建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 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赖传珠为参谋长, 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又将在华中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的7个师。

前此, 皖南事变尚未结束时, 当中共中央获悉项英中途离队, 不告而别后, 即让刘少奇致电叶挺、饶漱石和皖南新四军各将领, 重申党中央关于“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 江南所有战争区域之党与部队工作统一归中原局领导”的决定。饶漱石突围抵上海后, 通过地下党电台向盐城和延安发出数电, 其中3月8日一电详细汇报了1月12日突围情况、叶挺下山谈判背景以及他本人在“子铤(16日)深夜派卫士下山收买一连长成功, (17日)晨由他代办便衣通行证等, 经沿途重重阻难而终离虎口”的经过。嗣后, 饶漱石即由上海地下党护送经地下交通线过江到达苏中根据地, 在那儿帮助工作半个多月, 于4月份抵达军部所在地苏北盐城。

中共中央书记处获悉饶漱石已安抵苏北后, 于3月27日通过决议, 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4人组成中原局, 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5人组成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

4月下旬, 饶漱石出席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原局会议, 并于4月30日在会上作关于东南党的问题的报告, 介绍情况, 总结经验, 检讨得失。

不久,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 将中原局改为华中局, 由刘少奇担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分会书记; 因邓子恢远在淮南并已内定调淮北新四军彭雪枫第四师工作, 遂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

部主任。接着,中共中央又任命饶漱石担任华中局副书记。从这时起,饶漱石协助刘少奇,对加强和巩固华中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建设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

项英的错误给新四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新四军新军部成立后的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肃清项英在建军工作中削弱党的领导、削弱政治工作的错误,加强对华中党和军队高级干部的党性教育。

新四军在皖南的惨败,使中共中央从项英的错误中引出对干部加强党性教育的极大重视。早在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就告诫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强调把“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视作“不可轻视”的“极大的问题”。

2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党内指示,要求将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一律传达到团以上干部。指出:“在传达与讨论中,要特别强调各部队干部党性的加强。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他们对党中央与军委的信任、尊重与服从。要克服一切自以为是的情绪,反对对中央及军委指示命令置之不理的态度,反对在党内形成独立自主,在政治上形成自成江山,漠视中央、漠视军委的现象。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要成为军队党之团结及肃清军队党内的游击主义的关键。”

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清算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使华中全党全军更坚决地自觉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

策, 华中局和军分会于5月中下旬先后召开了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军分会扩大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 饶漱石配合刘少奇和陈毅,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会上, 饶漱石作了关于皖南事变问题的长篇报告。在报告中, 他以大量事实令人信服地总结了造成皖南事变的主客观原因。在分析主观原因时, 饶漱石深刻地指出, 东南局在项英领导下, 在执行中央总的路线方面, 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重大错误, 同中央总的路线有着重大的分歧。具体为: 第一, 项英不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曲折性; 第二, 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丧失自己的立场, 一切以服从国民党、迁就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尾巴为满足; 第三, 不懂得坚持党的独立性, 处处企图把党同军队分开; 第四, 压制甚至不要群众运动; 第五, 个人英雄主义的领导到离开党的倾向; 第六, 违抗中央命令。

由于饶漱石是以皖南事变亲历者和同项英作斗争的形象出现的, 因此他的发言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重视。刘少奇、陈毅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与会人员以项英的错误为鉴, 对照华中各地工作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 清算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 进一步提高了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这两次会议对华中高级干部是一次非常及时的思想路线教育, 使华中全党全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饶漱石以在白区从事过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在皖南事变中的突出表现, 以及在华中局高干会上对项英错误条分缕析的深刻批判, 很快就赢得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的信任。

华中局高干会议和军分会扩大会议后, 华中全党全军、各战略区、根据地都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军事、政权建设, 进行了一系列艰

饶漱石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 1941年5月18日。

策, 华中局和军分会于5月中下旬先后召开了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军分会扩大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 饶漱石配合刘少奇和陈毅,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会上, 饶漱石作了关于皖南事变问题的长篇报告。在报告中, 他以大量事实令人信服地总结了造成皖南事变的主客观原因。在分析主观原因时, 饶漱石深刻地指出, 东南局在项英领导下, 在执行中央总的路线方面, 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重大错误, 同中央总的路线有着重大的分歧。具体为: 第一, 项英不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曲折性; 第二, 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丧失自己的立场, 一切以服从国民党、迁就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尾巴为满足; 第三, 不懂得坚持党的独立性, 处处企图把党同军队分开; 第四, 压制甚至不要群众运动; 第五, 个人英雄主义的领导到离开党的倾向; 第六, 违抗中央命令。

由于饶漱石是以皖南事变亲历者和同项英作斗争的形象出现的, 因此他的发言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重视。刘少奇、陈毅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与会人员以项英的错误为鉴, 对照华中各地工作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 清算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 进一步提高了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这两次会议对华中高级干部是一次非常及时的思想路线教育, 使华中全党全军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饶漱石以在白区从事过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在皖南事变中的突出表现, 以及在华中局高干会上对项英错误条分缕析的深刻批判, 很快就赢得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的信任。

华中局高干会议和军分会扩大会议后, 华中全党全军、各战略区、根据地都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军事、政权建设, 进行了一系列艰

饶漱石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 1941年5月18日。